

第二十一回

北大红楼传真理 亢慕义斋译文章

1920年2月下旬的一天傍晚，空中纷纷扬扬地飘起雪花，古老的北京城完全笼罩在一片混沌之中。城里店铺早已关门，街上人迹罕见，显得冷清极了。偌大一个都市，只有一处例外，那就是位于东城的马神庙公主府的当年北京大学所在地。1898年戊戌变法时，清政府辟出这块地盘办起京师大学堂。后来，随着建校规模的扩大，北京大学原校舍不够用，又向北河沿和汉花园（即今沙滩）发展，不过北大大部分学生的食宿和其他活动仍在这里。

这一天正值新学期开始，新生入学，老生报到，来自全国各地的充满朝气的热血青年聚集在一起谈天论地，欢声笑语犹如一股初春的和风，从冰冷的古都吹过，使人感到一丝暖气。

在西斋学生宿舍的一间寝室里，一群学生正围在火盆前，分享着从家乡带来的土特产，闲聊假期中所见所闻的新鲜事，盆里的炭火映红了一张张稚气的面孔。忽然，有人大声道：

“各位知道否？本学期我们学校正式破例招收39名女生人文科旁听，这条消息见报了。”

大家的目光朝“新闻发布人”投去，这说话人不过20出头，衣冠整齐，头发剪成学生式，稚气的脸庞上架着一副眼镜，显得文质彬彬。他姓商名章孙，广东番禺人，其父商衍鎏系清朝光绪年间翰林，是名噪一时的国学大家、书法家和国画家。章孙的大哥

是研究德国文学的专家，二哥是史学和考古学专家，都年轻有为。章孙两年前考入北大，现是德文专业二年级学生。大家听他一说，话题就转到男女同校上，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开来。

原来，辛亥革命后，在男人剪辫子、女人不缠足的同时，教育上也有个进步，就是各地都办起了女子学校，但是，除了民国元年蔡元培任教育总长时改订学制，实行过初级小学男女同校之外，一直到 1920 年初，全国中学和大学都没有男女同校的。这样一来，许多女子要求深造的机会无形中被剥夺。同时，由于在学校、社会乃至一般娱乐场所中，男女之间依旧被封建主义的藩篱严实地隔阻着，造成男女正常交往的极大不便。对此，北大学生是颇有感触的。五四运动前夕，为了串连女同学一起闹学潮，北大曾派出一群男生到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前身）去，但他们还没进门就被挡住。后经反复交涉，校方才安排一间很大的房子以供来访的男士和女高师的“闺秀”们见面。见面时，在大屋子的中间坐着几名年老的女学监，起“界隔”的作用，再一头坐男生，一头坐女生。因为房子大，距离远，说话声音小了听不清，大了又不礼貌，好多话只得请隔夹在中间的学监传达。这就是当时男女生相处的情形。

蔡元培是提倡女权的先觉者之一。他顺应世界潮流，合乎人群期待，不顾社会上守旧势力的强烈反对，着手打破数千年封建藩篱，开中国男女同校之先河。1919 年底，他在接到邓春兰等女青年，尤其是署名“新青年一分子谢楚桢”请求北京大学开放女禁的信后，便在报纸上公开声明说：“欢迎女青年投考北大，程度及格，亦可录取。”果然，1920 年新学期，北大就录取了王兰、邓春兰、韩恂华、赵懋云、赵懋华、赵寿璧、程勤若、奚湏、查晓园等 9 名女生入学旁听。此事成为当时社会的一大新闻。

能和女生同校同教室读书，男学生可乐了，大家兴奋得说个不停，寝室里像开了锅一样。

个把小时过去了，大声的陈述和争辩渐渐停息下来，这时同学们才注意到以往在这种热闹场合总是扮演主角的邓康此时默默无言，双手托颊，若有所思。

邓康（中夏），生于 1894 年，湖南宜章人。其父是清朝举人，当过省参议员、县长，旧学根底很深。邓中夏从小接受传统文化的熏陶，有较好的古典文学修养，还写得一手好字。1917 年，他随父亲到北京，秋天考进北京大学文学系。到北京不久，十月革命的惊天炮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带到中国，本来就关心国事民瘼的这位来自湖南南部的青年，一下子就被科学社会主义思潮所吸引，不久成为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教授的追随者。

这时，邓中夏见同学们疑惑不解的一双双眼睛瞧着自己，便站了起来。他先从国际形势讲起，深入分析了国内状况，探讨了新时代青年肩负的社会责任，最后落脚到国民社当前面临的任务和今后的发展方向。

他条分缕析，字句铿锵。同学们听得十分认真，屋里一点杂音也没有。

原来国民社和新潮社一样，都是“五四”前夕涌现出来的社团，成员主要是北大学生。这两个团体在青年中具有全国性影响，是新青年派的有力助手，新文化阵营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二者又各有特色，国民社注重于社会政治问题的研究，把挽救民族危亡、改造中国政治当作首要任务；新潮社的旨趣则在语言文学、哲学和历史考据方面，主张社会改良和渐进发展，着重于文化思想方面反封建的后蒙活动。“五四”运动后，国民社的学生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对政治问题、社会问题更加关注，并在北大图

书馆主任李大钊的影响下，逐渐成为社会主义尤其是布尔什维主义的仰慕者。而新潮社的学生则以胡适为首领，倾向于纯学术的国故整理运动。两大团体因旨趣不同，矛盾实难避免。

邓中夏发言时表情严肃认真，他刚理的平头，竖立的头发，和刀切斧砍般的面部轮廓，给人一种阳刚有力的印象。讲到激动之处，只见他紧攥拳头，声音也激昂起来：

“同学们，我们要继续发扬‘五四’运动传统，与社会上恶势力作不妥协的斗争。……在北大，我们一定要与新潮社那帮人争地盘，大力宣传我们的主义，提高广大学生的思想觉悟，把更多的同学团结在我们周围，发展和壮大国民社……”

邓中夏一讲完，屋里的学生便展开了讨论。大家很重视他的意见，商量出一套巩固和发展国民社的办法。但同时又感到，随着“五四”之后新的问题出现，理论跟不上形势的发展；“民主”和“科学”的口号不能包医百病，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又知之甚少。这该怎么办呢？……此时，同学们不约而同地想到导师李大钊先生。

北京东城汉花园迤东的沙滩大街路北，矗立着一座 4 层的红砖砌成的大楼，这就是著名的北京大学的红楼——李大钊和毛泽东曾经工作过的地方。

红楼是在 1918 年，即北京大学建校 20 周年时建成的。红楼的第一层，即最下一层，主要作图书馆之用。李大钊是 1918 年 1 月任图书馆主任的。红楼建成后，图书馆迁此，他就在东南角一间房子里办公。北洋军阀黑暗统治时代，李大钊在红楼高擎火炬，照亮了广大进步青年的心。

近一个时期，李大钊的心情也是沉重的。他看到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马克思列宁主义已经在中国知识界中逐渐传播开

来，许多有志青年如饥似渴地寻求介绍马克思列宁主义、介绍科学社会主义思潮的书籍，谈论社会主义已经成为一时的风尚。但是，在科学社会主义传播的同时，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基尔特社会、新村主义、空想社会主义以及托尔斯泰的无抵抗主义……等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小资产阶级的空想，也打着“社会主义”的招牌乘机流传起来。这就如同久壅的水渠，一旦开放，未免泥沙俱下，旁流杂出。而一部分热心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革命青年，受到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只是一鳞半爪，很不系统，故而对许多问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再则，新文化阵营也出现了裂痕，胡适等人公开起来反对和阻止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五四”运动的风暴刚刚过去，新文化阵营的骁将胡适就起来检讨这场运动的所谓“激进”。他以改良主义反对暴力革命，用实验主义诋毁马克思主义。1919年7月，这位博士在《每周评论》第31号上面，刊登了自己的大作《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他声称“一切主义都是某时某地的有心人对于那时那地的社会需要的救济方法”，否认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的适用性，主张一点一滴的改良。李大钊读到这篇文章非常气愤，认为原则问题无让步余地，遂决定公开应战。8月8日，李大钊在《每周评论》第35期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与知识界的右翼代表胡适展开“问题”与“主义”的论战。他指出：“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所以，研究问题必须有主义作指导，而且“我们只要把这个那个的主义拿来作工具，用以为实际的运动，他会因时、因地、因事的性质情形生一种适应环境的变化”。并驳斥胡适说：“必须有一个

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仅仅靠“一点一滴的改良”是不行的！接着，他又在《新青年》第6卷第5、6号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进一步回击了反对派和胡适等右翼文人对马克思主义的诬蔑，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很显然，马克思主义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论战的帷幕已经拉开，昔日的盟友已在剑拔弩张。争论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但是，当时的中国，在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下，云压天低，阴霾笼罩，甬说一般人不了解马克思主义，就是知识界的大多数对马列主义的了解也极为肤浅。中国向何处去？国人颇感迷惘。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进一步广泛地、有组织地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就成为推动中国革命运动向前发展的一项迫切任务。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李大钊挺身而出，肩负起时代的重托。他这时已经由一个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同时，由于他在中国最先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由于他在“五四”运动中所起的卓越作用，他在北京的知识界特别是在青年知识分子中有着崇高的威望，这使他很自然地成为北京研究和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带头人，许多青年把他看成是自己思想和信仰的导师。

新学期伊始，北大不少同学课余之后，就急切地冒着漫天黄沙到红楼来看望敬爱的导师。他们拉家常，谈学习感受，聆听恩师教诲，请求给以帮助。看着这些充满活力的年轻人，李大钊脸上总是挂着慈祥的微笑。他认真听同学的谈话，耐心解答提出的问题。他的谆谆教诲，真知灼见，如春风雨露，滋润着这些先进知识青年的心田。邓中夏、高君宇、张国焘、罗章龙等人更是时常去红楼图书馆主任办公室的学生，并成为李大钊在中国大地上

首先播下的几颗共产主义的种子。

以此为基础，李大钊审时度势、因势利导，在与青年的广泛接触中，开始了宣传共产主义的组织活动。

1920年3月的一天，初春的太阳冲破低垂的阴霾，把大地照射得暖烘烘的，冰雪渐渐消融，埋藏在沃野中的万物开始苏醒，北京东城沙滩一带春意盎然。这天上午，在红楼图书馆主任办公室里正开着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中国第一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出席会议的有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朱务善、罗章龙、张国焘等十多人。

大家怀着异常激动的心情，倾听敬爱的导师李大钊发表重要演说：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的目的，是为了寻找解放中国的真理。首先，要求大家在介绍马克思学说的同时，真正明了马克思学说的实质；其次，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分析中国社会经济状况，以及帝国主义侵略的本质，为中国解放指出一条光明大道！

大家报以热烈的掌声。

接着，大家讨论并通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章程，确定“以研究关于马克思的著作为目的”；对马克思学说有研究兴趣和愿意研究马氏学说的人都可以做本会会员”。这个章程在校长蔡元培支持下，登在了《北京大学日刊》上，引起很大的社会反响。

那时，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员是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军阀、官僚以及社会上顽固的守旧派把马列主义视为“洪水猛兽”、“异端邪说”，将学习和宣传科学社会主义的人视为“过激派”。反动统治者的严禁和封锁，使得连一般性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书籍都很少，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等人的原著更

难找到。由于进步知识青年所能读到的只限于《新青年》和其他报刊上发表的一些有关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以及为数极少的马克思主义著作的中文节译本，所以，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后，迅即决定下大力翻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原著以及相关的西文著作，把中国人学习马列主义的活动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后，经过李大钊和会员们的共同努力，逐渐搜集了一批马列主义书籍，包括原著单行本及有关刊物转译、摘刊的马列经典文献计达百余种。不久，便设立了一个附属于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小型图书馆，地址在马神庙景山东街公主府，即北京大学理学院迤西的第一宿舍，黄字号一所平房。

这个小型图书馆既可藏书，也可供研究会成员学习、研究和进行翻译工作。在给这个图书馆取名时，还有过一番小小的争论。起初大家都主张定名“共产主义小室”，随后意识到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取这个名字不够稳妥。于是，大家开始讨论起来。

在议论中，北大德文班学生宋天放，这位湖南籍的青年力主取名为“亢慕义斋”，他在讲述理由时说：

“《周易》乾卦爻辞称‘亢龙有悔’，历代注释者都把‘亢’解释为‘穹高’、‘穹极’，即现在我们所说的理想境界之意，所以我坚决主张称‘亢慕义斋’。”

宋天放目光炯炯、态度坚决、引经据典、口若悬河，他一边说一边把他事先篆刻的“亢慕义斋”的图章举起来。大家被他那执着和憋气逗乐了，但同时觉得他讲的不无道理，因为，这“亢慕义”也是英文“Communism（共产主义）”的谐音。这样，“亢慕义斋”的名称就为研究会成员所接受了。

“亢慕义斋”是“五四”时代思潮激化的象征，她代表了当时思想界新的倾向与新的努力。从此，在中国掀起了一个翻译西方马

列著作的巨大浪潮。

那时，在李大钊的领导下，“亢慕义斋”为了有计划地翻译新思潮书籍，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为重点，设置了英、法、德、俄、日等语种的翻译组 5 个，荟萃了一批外语功底好的先进青年和有造诣的进步学者，阵容强大。

各翻译组人员均系自愿参加工作的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会员。他们中的大部分后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人民革命事业作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研究会的翻译人员，最初人数不多，后陆续增加到 60 余人，阵容颇为可观。在这样的形势下，研究会决定召集一次扩大会议，研究开展译书工作的有关问题，这就是在马神庙公主府“亢慕义斋”召开的译学会议。

其时，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留居北京的会员全体出席。由会议主持者首先发言，介绍过去中国译学进展情况，回顾中国自汉、唐以来译书事业曾一度兴旺的盛况。如：唐玄奘在洛阳白马寺建立人数众多的译经团体。我国译书经典卷帙浩繁，其社会影响极大，晋、唐所译大方广佛华严经两种译本，分别为 60 卷和 80 卷，等等。

随后，会员自由发言讨论，气氛十分活跃，围绕散文与韵文、直译与意译等问题，各抒己见，不厌切磋。最后，由日文组译员贺天健用带湖南味的普通话作了总结发言。他郑重说道：

“东方文化发生较早，欧洲文化起步较迟，但自中世纪以来，西方科学迅速发展，工商业突飞猛进，东方反而落在西方后面，今日我们引进西方哲学、文史与科学，成为当务之急。我们应迎头赶上，不能再昏睡不醒了。”

一席话简捷明了，说出了大家的心声，大家一致鼓掌赞成。

会议还决定多方设法增加中西文图书，不分地域与方法，广

泛征集，积极搜求。提出的口号是：“后石室之秘藏，译百国之宝书。”为了争取达到这个目的，决定会员译书稿费全部捐献学会作为购置图书费用。

在译学会议之后，大家同意根据学会精神按照需求与可能的情况拟一个切实可行的计划，即先规定一般的任务，然后由组员志愿承担选定译书，按期完成。此议既定，大家立即分头实施，同时分函上海、广州等地的出版机构接洽出版事宜。

为了便于理解和准确翻译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德文组的商章孙和罗章龙选择了《康德传》的翻译任务。两个小伙子热情饱满、精力充沛，加之对中西文化造诣不浅，保证了译著的质量。特别是章孙童年时代曾随家远游欧洲，留居柏林，在当地中学肄业，因此他的德国语文根底极深。他和国文素养好、干劲十足的罗章龙搭档，只用一年时间就完成了《康德传》的翻译工作，受到导师李大钊和会员们的夸奖。由于该书译得好，蔡元培校长审定后，亲自向上海中华书局推荐，于 1922 年出版。以后，此书又多次再版。这样，《康德传》遂成为“亢慕义斋”首先完成的译著。

“亢慕义斋”还将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德文原本（1848 年伦敦版）翻译成中文，并附注释。由于《共产党宣言》中有些词句文意艰深，翻译难度大，工作进展很慢。如《共产党宣言》的第一句话：“有一个幽灵，共产主义幽灵，在欧洲徘徊。”大家认为“幽灵”这个词不太好，但又找不到合适的词句。有的会员说：“或直译，然后把意思作一个说明。”大家认为，“幽灵”在汉语中是一个贬义词，在德文中“幽灵”这个词就是“鬼怪”的意思。还认为“徘徊”这个词也不好，因为没有指出方向，所以加注释：“欧洲有一股思潮，像洪水在欧洲泛滥，这就是共产

主义。”类似这样的说明有七、八处之多。

在李大钊的号召与组织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员还译过《资本论》第一卷，编译过《康慕尼斋丛书》、《列宁丛书》和《马列主义丛书》等。

“亢慕义斋”宣传科学社会主义的译书计划，曾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中，有步骤地进行着，为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改造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作出过不朽的贡献。这是后话，顺此交待。

再说，北京的天气，4月一过，黄沙就逐渐停了。到了5月，湛蓝的天空飘着白云，鸟语花香，气候宜人，是郊游的好时光。然而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成员却没有功夫去郊外踏青，或游览名胜，他们在李大钊先生领导下，进行着紧张的活动。当时，邓中夏等人每天一大早就到北京大学三院阅读马克思主义书籍，下午从事政治和社会活动，晚上聚在一起讨论问题或交换学习心得，总要到深夜后才就寝。通过这些有组织的活动，他们加深了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了解，并产生了进一步组织起来开展革命斗争的强烈要求。

一天中午，邓中夏、高君宇、易克嶷、张国焘、范鸿劼、任国桢等人去红楼图书馆主任办公室，刚落座，白面书生范鸿劼就涨红着脸十分认真地说起来。这位湖北青年比邓中夏小3岁，文气十足，写得一手漂亮文章，但不善言辞。他这时激动异常地提议说：“我们应该将北京的组织向全国辐射，在各省广泛地建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范鸿劼的意见得到大家的赞同。

李大钊听后，欣然赞许，并告诉同学们说，这件事已经和陈独秀商谈过，并作了必要的分工。长江以北除北京以外，创建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条件成熟的还有天津、唐山、济南等地。他建议

张国焘在去唐山考察工人运动的同时，和工运领袖邓培、俞德等人协商，推动在天津、唐山尽快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接着，李大钊又向同学们介绍了济南的情况：

“经过‘五四’运动洗礼，济南建立组织很有基础，那里有两名学生运动的领袖，一个叫王尽美，另一个叫邓恩铭，两人的革命热情都很高。我认为应与他们取得联系，通过他们在济南建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大家认为如何？”

大家一致同意李大钊的建议。

邓中夏还补充道：

“我建议由陈为人同学去联系此事，怎么样？”

大家对个头不高、办事干练的陈为人很放心，纷纷表示同意。

接着，邓中夏又说道：

“李先生，我们应当尽快地和第三国际取得联系，以期得到他们的指导。”

“我已经和他们联系上了。”李大钊望着同学们那一张张兴奋的面孔，深沉地说，“眼下，极需要一位可靠的翻译，便于沟通。”

“这事好办。”罗章龙说道，“我有一位要好的朋友，他是江苏人，天津北洋大学毕业，叫张太雷，中夏、君宇、克崑都同他熟悉。张太雷的英语水平很高，还是天津学生联合会评议会的评议长，是天津‘五四’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学生领袖，去年8月为营救因抗议山东惨案被捕的天津请愿代表曾来过北京。他极喜欢先生的文章，几次来信都表露过想拜识先生的意愿。”

李大钊听后，用手扶了扶眼镜架，略微沉吟，然后和蔼可亲地说道：

“罗章龙同学，请你给他写信，邀他到红楼来作客。具体的

事，等见面后再定。”

接着，大家又讨论起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知识分子到工农中去以及工人运动等问题，做出了“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扩大活动范围的决议。李大钊还强调，除了在城市宣传讲演，也要注重到农村和工厂去宣传讲演，并可在长辛店设点讲演，向工人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进一步提高产业工人的思想觉悟，使那里成为革命的一个有力据点。

这天从中午一直讨论、研究到夜幕降临，大街上亮起昏暗的灯火，同学们才告辞回到学生宿舍。

1920年春天，经过李大钊和同志们的共同努力，建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和“亢慕义斋”，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得到更加广泛的传播，科学社会主义日益深入人心，从而为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作好了思想准备，打下了政治基础。尽管当时政治气候还异常寒冷，严冬尚未过去，但俄国十月革命的炮声早已传到中国，“五四”爱国运动又为旧时代划上了句号，亚洲睡狮开始觉醒，东方古国晨曦初照，一个新的时代已经开始，一切反动派都无法阻挡历史潮流，中国革命的形势正迅猛地向前发展，红楼的火种就要燃遍神州大地。

正如后来吴玉章为红楼题词所描绘的那样：

“欣看星星之火，已成燎原之势。”

要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二回

伸正义仲甫出狱 别同志守常送友

第一卷已经交待过，“五四”运动爆发不久，出于内外的种种考虑，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于5月9日晨，悄然辞职赴津，随即南下归乡。其时，陈独秀的好友料到陈独秀在京必多危险，也来函来电催促他离开北京，暂避风头，但一直没说动他。陈独秀是个意志刚烈的人，他性情急躁，嫉恶如仇，北京当局的暴行激起他满腔怒火。对朋友的劝告，他回答道：“我什么地方也不去，脑筋伤透已极，政府早点捉我下监处死，正是我求之不得的事，我不愿意在这恶浊的社会苟活下去。”

大家都知道陈独秀的犟脾气，见他这么说，也拿他没办法。嫉恶如仇的陈独秀目睹中国优秀的知识分子，一批力图改造中国的先进青年竟然被黑暗、专横、独裁、冷酷的北洋政府拘禁，作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他力图将运动引向深入。所以，他不仅在6月8日前后写了《北京市民宣言》，提出了“平民征服政府”的具体纲领要求，并且亲自印成一大摞传单，然后组织同伴，带头前往公共场所散发。

由于他毕竟缺乏从事秘密政治斗争的经验，遂于6月11日被便衣警探在“新世界”游乐场当场抓捕，随即被关押在警察厅拘留所里。当夜，又有军警数十人，荷枪实弹包围了北河沿箭杆胡同陈独秀的寓所，亦即《新青年》编辑部。夫人高君曼及子女等人，均被军警的厉声吆喝所惊起。正在高氏准备前去开门时，穷

凶极恶的军警们居然破门而入，并立即分头抄家、搜查。结果翻箱倒柜，掀盖揭锅折腾了大半夜，却大失所望，没有抓到可以用来定罪的有效凭据。怎么下台呢？这些有着迫害民众经验的政治打手们，无可奈何地竟将陈独秀与朋友联系的私人信札多件搜持而去。

再说陈独秀在拘留室里，躺在木板拼成的床铺上，和衣而卧，辗转不眠。他想起了 1913 年参加讨袁的‘二次革命’失败后被捕入狱的经历，于是，在这次被捕后，他凭借前次应对公堂的体验，编了一套‘口供’，以备不虞。

一觉醒来，天色大亮。狱卒催他赶快吃饭，说罢递给陈独秀一个棒子面做的小窝窝头，一块酱萝卜条和一碗稀如菜汤的粥。陈独秀吃了一口小窝窝头，但那难闻的霉味使他无法下咽，只得赶快吐了出来，结果，他只喝了半碗掺和了泥沙的稀粥。

12 日上午，外右五区警察署设公堂提讯陈独秀。陈独秀毫无惧色，坦然答道：

“……当蔡校长在校时，我请假回安庆，于前几日来京。路过上海时，经上海学生联合会友人徐某交给我这传单一摞，叫我到北京散布。本月 11 日上午 10 点钟，我将传单送到北京学生联合会四五百张，交给不知姓名的高等师范生收讫。晚 9、10 点钟，我到新世界散发传单，已散去数十张……”

陈独秀如此这般地编造了一套供词，除了不得不承认散布《宣言》外，其他如请假回安庆、上海友人徐某及不知姓名的高师学生等，全是诌骗警署的自编自话。但警方因再无其他的证据和借口，只好又将陈独秀先行收监。

陈独秀被捕后，李大钊得讯焦急万分，他立即找到高一涵了解陈独秀被捕的经过，又要高一涵赶去陈独秀家了解搜家情况。

然后，他与罗章龙、邓中夏、高一涵等少数好友在红楼北大图书馆主任办公室内长时间地商议营救办法。他们考虑来考虑去，认为最佳的办法是尽快让陈独秀无辜被捕的消息公开报道出去，引起社会的关注，形成强大的舆论，从而迫使北洋政府有所顾忌，而不致加害于陈独秀。

6月13日，北京《晨报》首先披露了陈独秀被捕的消息。接着，各地大报都相继作了报道，从而引起社会各界的震惊和关注。各省、各界纷纷函电交驰，为陈独秀辩白，抨击当局无理拘陈的横暴行径，呼吁政府郑重处置，及早开释陈独秀。

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北大全国校友会和全国学生联合会等团体积极进行营救活动。北京学联于15日致函京师警察厅总监吴炳湘说：“陈先生夙负学界重望，其言论思想，皆见称于国内外，倘此次以嫌疑遽加之罪，恐将激动全国学界再起波澜。”

全国校友会联合会在致徐世昌要求释放陈独秀的电中说：“陈独秀被捕，士林惊骇。持论是否偏激，国人自有公评，不得横加摧残，防民之口，其可得乎？”

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医学专门学校等9个单位40人，以及民国大学、新华商业专门学校、私立毓英中学等7所学校29人，分别于16日、20日联名呈警察总监，请予保释陈独秀。这69人中，有名教授和中学教员，有许多新派人物，也有旧派人物，如刘师培等。呈文中说：“陈独秀虽然有越轨的嫌疑，但他也是出于爱国之心，动机是好的，希望予以宽大，由我们具保释放。”其措辞和语气都较学界缓和许多。

陈独秀是安徽怀宁（今属安庆市）人，京师警察厅总监吴炳湘也是安徽人。于是旅京安徽同乡会和旅沪皖人组织安徽协会通

过同乡关系，纷纷为营救陈独秀奔走说情。其中既有陈独秀的好友，也有与陈独秀互不相识的人，还有桐城派马通伯、姚永概等这类在学术见解上和对白话文运动持非议的古文学家。他们敬佩陈独秀的文章、才华和品格，痛恨北洋军阀政府的专横、独裁和冷酷，所以也纷纷函、电并用，多次向吴炳湘要求尽快开释陈独秀，并且强调：“陈独秀的言论虽然有些不妥，带有书呆子气，但陈独秀的学问和人品都是值得称道的，当看在同乡的情份上，请予以保释。”安徽省长吕调元也致函吴炳湘：“怀宁人陈独秀好发狂言，书生积习。然其人好学深思，为了家乡人材计，保全省释。”

此外，还有国民大会上海干事部、中华工业协会、江苏省教育会以及社会名流，诸如广东军政府秘书长章士钊、对“五四”运动持反对态度的田桐、广东军政府主席总裁岑春煊也都出面致电北京政府当局，呼吁释放陈独秀。内中上海中华工业协会在给北京政府请释陈独秀的通电中，明确指出：“今值全国人民愤激刚息之时，当局岂可骤兴文字之狱，而以北京学潮迁怒陈君一人？！窃恐大乱之机，将从此始。我等与陈君均无一面之交，为大局计，特据实道陈，务恳诸公平情主持，立予释放，以全士气，而救国危！”

不少社会高层人士在呼吁立即释放陈独秀的电文中均直称此次捕人事件实为又兴文字狱。章士钊这位曾任北大文科研究院教授兼图书馆主任而与陈独秀同过事的闻人，直电北京政府代总理龚心湛等要人说：“陈君此次虽因文字失当，亦何至骤兴大狱，视若凶犯，至断绝家常往来。且值学潮甫息之秋，岂可忽兴文网，重激众怒。试观古今中外，每当文网最甚之秋，正其国运衰竭之候，以明末为殷鉴，可为寒心。今日谣诼繁兴，清流危惧，乃迭有此罪及文人之举，真是国家不祥之象，天下大乱之基也。”